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44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4 期 · 总第 44 期

热点观察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1
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利好.....	7
严监管强治理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9
全球经济合作展现强大韧性.....	11

学科前沿

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	12
中国百年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与经验.....	15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四方面发力.....	19
脱碳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助推力量.....	20

经管资讯

美欧暂停贸易战火.....	23
外资为何青睐人民币债券.....	24
电商消费狂潮背后的新模式探索.....	25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26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 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6月2日)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年度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总结过去一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工作，部署下一阶段持续一体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点任务。

1 直面市场主体需求，创新实施宏观政策并与“放管服”改革相结合取得明显成效。

2020年，面对多重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及时果断又保持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紧扣市场主体急需，创新实施宏观政策，并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相结合，助企纾困与激发活力并举，有力促进了经济较快恢复发展。

1.1 在创新实施宏观政策中运用“放管服”改革思路和办法，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量大面广的市场主体，对就业和基本民生带来严重影响。我们在“六稳”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将保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重，以此来保就业保民生。财政、货币、就业政策都围绕市场主体，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紧密联系起来，做到直接管用、精准高效，从根上“浇水施肥”。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6万亿元，同时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1.5万亿元。企业普遍反映，减税降费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公平的措施，为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创新建立了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资金“一竿子插到底”，大幅减少了中间环节，省级财政在中央新增财力上只当“过路财神”、在地方财力上不做“甩手掌柜”，共同快速为市县基层利企惠民补充财力。以往中央财政资金层层分解下达到基层平均用时超过120天，去年最快的只有7天，政策的好处以最快速度惠抵市场主体。为管好用好直达资金，我们强化全链条监控，防范资金套取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从审计结果看，直达资金使用情况是好的。我们还通过货币政策直达工具，精准快速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说，紧扣市场主体急需来纾困、建立直达机制和工具，是“放管服”改革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创新实践，发挥了宏观政策落实“加速器”和

效果“倍增器”的作用。

1.2 面向市场主体切身需求，以更大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抓手。与财政、货币政策相比，“放管服”改革基本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且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具有事半功倍、一举多得的效果。政简易行，政繁难办。我们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压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压减办照、通关、办电、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时间，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简易管，政繁易腐。我们坚持放管结合、并重，强化食品、药品、疫苗等重点领域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新型监管，有力维护公平竞争。政简便民，政繁扰民。我们推动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这些改革抓住了关键点、打到了要害处，而且公开透明、简便易行，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效果不亚于财政货币政策投入的资金，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软投入”。“放管服”改革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疫情最吃紧时，有关部门快速启动防疫和医疗物资应急审批，并严厉打击不合格产品和非法经营行为，推动口罩、防护服等产能迅速增加。疫情初期，口罩日产量只有600万只，但很快就上去了，目前日产能已超过12亿只。多年来深化“放管服”等重点改革，助力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网络购物、远程办公、线上教学与医疗等无接触服务，便利了群众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些有力促进了抗击疫情和防控成果的巩固，维护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地区积极探索“放管服”改革，普遍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在许多领域创造出“单项冠军”，“一业一证”、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按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等创新举措，受到企业和群众广泛欢迎。

1.3 助企纾困与激发活力并举，有力保住和催生了大量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稳住就业和经济基本盘的有力支撑。在去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虽然在一季度明显下滑，但全年仍达到2500多万户，呈逆势增长态势；今年前4个月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新设市场主体近900万户。保住了市场主体，也就稳住了就业。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从最高时2月份的6.2%降到年末的5.2%。有就业就有收入，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新设市场主体迅速成为重要税收来源。2013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在当年纳税1600亿元；到去年，近几年累计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纳税达3.82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国税收收入的1/4，也超过去年的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面对多重严重冲击，上亿市场主体展现出强大韧性。实践证明，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上升。国内经济恢复还不均衡，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仍面临不少困难。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仅高校毕业生就达909万人。虽然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降到5.1%，但8个省份在6%以上。我们要继续围绕市场主体关切，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和货币政策直达工具，同时深化“放管服”等重点改革，帮助市场主体进一步恢复元气、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鉴于经济增长在稳定恢复，今年我们不再实施部分阶段性应急政策，但没有急转弯，而是实施了新的结构性减税等冲抵政策，并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普惠金融支持。总体看这些政策落实是好的，但也有企业反映，由于不知晓政策、申请手续比较繁杂等原因，没有享受到政策的好处。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加大政策宣介力度，优化政策落地机制，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努力使“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快速兑现。

2 着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市场主体。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不断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挑战，保住市场主体、“留得青山”，并努力使市场主体更加活跃、“青山常在”，我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2.1 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基本靠国家计划来调配。改革开放后，通过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生产经营主体，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很快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并在生产发展中逐步提高生活水平；鼓励回城知青自谋职业，支持个体经济、民营企业发展，使他们很快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先是下放经营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利改税”，再迈向现代企业制度，在改革中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对外开放进程中，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并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同国内企业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发展壮大。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市场主体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近年来，我们着眼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深化“放管服”等重点改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适应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顺应了人民群众就业创业的需要。“放管服”改革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旨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上届政府成立之初，我们把简政放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先手棋”，不断推进商事制度等改革，着力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为他们厚植发展壮大的土壤，并加强事中事后、公平公正监管。通过这些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极大便利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中市场主体立了起来。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按照条例，市场主体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据统计，2013 年以来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总数由 2012 年的近 5500 万户，增加到今年 4 月份的 1.43 亿户，增长了 1.6 倍。其中，企业从 1300 多万户增到 4500 多万户，个体工商户从 4000 多万户增到近 9600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从近 70 万家增到 220 多万家。这与“四经普”反映的市场主体较快增长情况是一致的。当然，看市场主体不能光看数量，还要看活跃度，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有生有死”是正常的，目前活跃度大体在 70%左右。

2.2 上亿市场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市场主体不仅数量增加、日益多样化，而且竞争力和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主体是稳就业扩就业的“顶梁柱”。实践证明，光靠吃财政饭增加不了多少就业，也不可持续，稳定和扩大就业还是要让市场主体“唱主角”。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基本上每年都超过 1300 万人，绝大多数是靠市场主体吸纳的。据相关测算，一个市场主体平均带动 8—10 人就业，只要实际运营的市场主体保持在 1 亿户以上，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就业就能保持稳定和比较充分。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就业的“大容纳器”，他们提供了 85%的城镇就业岗位，相当程度上支撑了 4.4 亿城镇就业人员、近 2.9 亿农民工就业。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市场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不竭源泉，也是提供税收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我们把减税降费作为应对挑战、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力举措，坚持制度性安排与阶段性政策并举，由点到面推开营改增，持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十三五”时期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 7.6 万亿元。这短期看增加了财政压力，但

长期看是“放水养鱼”，涵养了税源、扩大了税基，能贡献更多税收，可以说是“水多鱼多”，形成良性循环。“十三五”时期的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过去五年合计纳税超过 7.8 万亿元，比同期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还要大。市场主体的发展优化了经济结构、壮大了新动能，促进了经济循环畅通。近年来市场主体数量每年都呈千万级增加，带来了大量新的有效供给和投资消费需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更是蓬勃发展，他们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和市场的“神经末梢”，对完善我国产业和市场体系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还要看到，市场主体的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推动了经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目前，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过 16%，许多传统产业也通过新技术新业态重塑了研发和生产经营方式。“十三五”期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由 7.6 万家跃升到 27.5 万家。有国外机构统计，去年全球 500 多家“独角兽”企业中，我国大陆有 112 家，数量位居第二。“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优质教育、医疗等民生资源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延伸，还拓展了市场空间。今年 1—4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22%，去年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渠道出口额同比增长 150% 以上，这为工农业生产、为对外贸易开辟了新的市场渠道。市场主体状况还攸关区域发展活力和后劲。实践表明，哪个地方市场主体发展得好，地方经济发展就好、民生改善就快。近年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主体发展状况不同。有的地方不仅新生市场主体少，甚至原有的市场主体不断流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居民就业、收入等也受到影响。这背后折射出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的差距。有关地区要狠抓营商环境的改善，把差距变成潜力，努力在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此来提升地区发展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当前市场主体创业发展仍面临不少掣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从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出发，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让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公平竞争，不断催生新的市场主体。政府还要优化公共服务，在“两个提供”上下更大功夫。一个是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在水电气热、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增加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好的条件。另一个是保障好基本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点加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保障，完善失业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基本权益保障等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要通过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免除后顾之忧，让人民群众敢于创业奋斗，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

3 聚焦市场主体关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条件，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土壤。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深化“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整体推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1 着力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

力行简政之道，秉持公平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进一步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要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今年要着力推进涉企审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抓紧编制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目前，部分领域的准入壁垒仍然不少，还有些市场主体因注销难该退而退不出。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着力推进照后减证并证，让市场主体尤其是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市场主体准入更便捷；加强部门衔接，扩大简易注销范围，使市场主体退出更顺畅，促进市场新陈代谢。要深化投资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整合审批流程，推行多规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做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行告知承诺

制，让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要动态优化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要让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更活跃。着力完善政策、消除障碍、搭建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注重运用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加大对“双创”的支持力度，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聚众智汇众力，提高创新效率。要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包括国企、民企、外企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但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要进行规范治理。垄断妨碍公平竞争、抑制创新与活力，与发展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有利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要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市场分割等不公平做法。要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我们一直强调，放权不是甩手不管，减权并没有减监管的责任，要坚持把“放”和“管”统一起来，把有效监管作为简政放权的必要保障。这些年“放管服”改革，“放”的主要是不涉及安全的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对涉及安全生产、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领域和事项，我们一直是慎之又慎，强调要实行全覆盖严格监管，不能有任何松懈。下一步要继续切实把好每一道关口，确保质量和安全。要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跨部门综合监管、“互联网+监管”和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对一些领域的监管不到位，要明晰基本职责，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重视企业合理诉求，加强帮扶支持，让市场主体安心发展、更好发展。要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优化。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已达 4.9 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超过 1.2 亿，要继续推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满足几亿“移动人群”办事需求。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便利化，用好政务服务平台，推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继续把企业和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政府的“心头大事”来办，今年要着力破解异地就医报销难、车检难、公证难等问题，实现企业常规信息“最多报一次”，分类完成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归并。总而言之，要用制度和技术的办法，让市场主体和群众依规办事不求人。

3.2 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

要坚持依法行政，以法治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要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法规体系。良法方能善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全面实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也即将出台，要扎扎实实落实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做好营商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当前要重点抓好行政审批、行政收费、政务服务、数据安全共享等领域法规建设。要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全面保护各类产权，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政府要带头守信践诺，各地区要梳理政府对企业依法依规作出的承诺事项，未如期履行的要限期解决，因政府失信导致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要依法赔偿，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执法不规范不仅会打击市场信心，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规范行政裁量权，纠正执法不严、简单粗暴、畸轻畸重等行为，提高执法水平。要从源头上清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凡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设定的罚款事项，一律取消。

3.3 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这既是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日益复杂国际形势的有效举措。虽然经济全球化短期遭遇逆流，但长远看仍是历史潮流，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随着“互联网+”深入发展，每个城市甚至每个社区、村庄都可能联通国际市场，关起门封闭运行是不行的，市场主体指望靠政府保护是没

有前途的。要发扬中国人的奋斗精神，敢于在国际市场竞争打拼，把国内市场当国际市场来竞争。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对全球市场主体而言，哪里营商环境好，那里的市场就更具吸引力、在国际竞争中就更具优势。近年来，我们对标国际先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大幅跃升。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管理制度和规则还存在差距。我国已正式签署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要以此为契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方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要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引领作用，在制度型开放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开放过程中，还要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切实维护国家安全。要进一步提升外资管理和服务水平。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进入已经开放的领域，让我国长期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同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为高层次外国人才来华创业创新提供便利。要进一步优化外贸发展环境。继续推动降低外贸企业营商成本，清理规范口岸收费，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国际物流畅通。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保险等支持，推动发展“海外仓”，加快相关标准与国际先进对标，助力企业更好开拓国际市场。

最后要强调，“放管服”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这次会议是我们连续九年第九次就推进“放管服”改革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攻坚克难，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强化改革担当，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勇于破除局部利益、部门利益，敢于“啃硬骨头”。要加强改革统筹谋划。“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放”、“管”、“服”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要放掉该放的，管好该管的，切实履行好政府服务职能，提升改革综合效能。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的指导和督促，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对锐意改革的地区和单位表扬激励，对改革推进迟缓、政策不落实的及时督促整改；地方和基层要继续结合实际主动探索，自主地改，种好改革“试验田”。要规范营商环境评价，以市场主体和群众的实际感受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力戒形式主义，防止增加地方和市场主体负担。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要以学习教育为动力，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工作实效，积极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发有为，实干创新，持续推进“放管服”等重点改革，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作者：李克强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6月8日第002版

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利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安排的突出特点：发展导向规则 and 标准导向规则并行；统一性与包容性兼顾；约束性与灵活性兼容；自由贸易新议题与 WTO 基本原则衔接。它是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胜利，必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1 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关税减让等措施将释放区域内巨大的贸易增长潜力。RCEP 生效后，区域内 90% 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超过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这将大幅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和产品价格，并释放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估计，到 2025 年 RCEP 预计将使成员国出口增长 10% 以上。投资负面清单与棘轮机制的结合将稳定并优化区内投资环境。RCEP 不仅以“非禁即入”的方式对 5 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并且以棘轮机制形成各方扩大开放的硬约束，将明显提高 RCEP 成员国市场准入的确定性。统一且开放包容的市场规则将明显提升区域内贸易投资效率。RCEP 的生效实施将使区域内部形成相对单一的市场与规则，并针对成员国不同情况采取过渡期和例外原则等包容、灵活的做法，务实、有效降低区域内贸易投资壁垒。有测算估计，RCEP 协定的全面实施将使成员方每年 GDP 增长 0.5%，并带动全球经济多增长 0.2%。推动东北亚与东南亚区域融合成为一体化大市场。通过 RCEP 协定，中日、日韩首次结成自贸关系，这将推动东北亚与东南亚两大区域板块市场的融合。同时，RCEP 鼓励各方在教育、人员资格、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制定互相接受的专业标准和准则，推动区域内服务业管理标准规则的互认对接。

2 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进一步融合发展

原产地累积规则将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发展。RCEP 使用区域累积原则的原产地规则，将增加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助推区域内企业建立完善的跨国产业分工体系。例如，RCEP 各成员国可依托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资源要素、中间品生产基础及发达经济体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形成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闭环。正负服务贸易清单相结合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发展。RCEP 各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均作出高于各自“10+1”自贸协定水平的开放承诺，并结合各自利益关切，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办法推进区域内服务贸易整体开放。这体现了包容性、灵活性与渐进性的特点，释放未来区域内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的稳定预期。统一的电子商务规则将加快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升级。RCEP 首次在亚太区域内达成范围全面的多边电子商务规则，在跨境信息传输、信息存储、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焦点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稳定、便利的制度环境，会对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亚洲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构建等产生深远影响。

3 东盟在区域经贸合作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性、主动性更加突出。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了

RCEP 由东盟提出，并以东盟为中心的事实。RCEP 整合了 5 个“10+1”自贸协定，缓解区域内经贸规则碎片化，增强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RCEP 秉持东盟“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承认差异性，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突出以共识为基础的区域合作模式，使“东盟方式”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和优势更加突出。发展导向的包容性规则安排促进东盟国家深度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东盟成员国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RCEP 充分考虑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需求，设立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并给予东盟最不发达国家过渡期安排。测算表明，发展水平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都将从中获益更多。东盟将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大市场的进程中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RCEP 区域内稳定的制度环境及较快增长的市场需求，是东盟国家经济复苏并增长的关键。预计到 2030 年，东盟 GDP 将达到 6.6 万亿美元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欧盟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RCEP 成员国将更多分享中国 14 亿人的消费大市场。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依托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和互补的产业基础，中国与东盟两个最具活力与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将进一步融合。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并在更多商品与服务领域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这给 RCEP 成员国带来重大利好。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市场面临历史机遇

抓住“窗口机遇期”尽快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市场。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抓住 RCEP 生效到成熟运作的“时间窗口期”，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与 RCEP 规则的叠加优势，尽快取得建立面向东盟区域性市场的重要突破，这既有利于尽快取得 RCEP 框架下区域内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的“早期收获”，也为各类企业投资东盟市场和分享中国大市场提供重要平台。以务实举措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融入东盟区域性旅游、商品和要素市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例如，利用免征进口关税及原产地政策等，吸引东盟国家农产品进口并在海南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增值 30% 以上再免关税进入中国 14 亿大市场；在疫情稳定后，海南要率先与东盟国家的岛屿地区开展邮轮旅游合作，实施游客互换、资源共享与联合营销，并推进旅游服务标准对接、人员跨境流动便利化等；依托金融开放政策，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服务东盟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尽快将建立面向东盟区域性市场的相关政策具体化。要参照 RCEP 贸易投资规则，围绕投资保护、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集成创新；要研究对标 CPTPP 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入棘轮机制，强化各方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预期；对表 RCEP 关税减让清单，适时升级海南自由贸易港“一负三正”零关税清单，扩大“零关税”覆盖范围；制定不低于 RCEP 最高水平承诺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强化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专业服务业管理标准规则对接；借鉴 RCEP 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条款，制定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查验程序与快速通关制度等。

从前景看，RCEP 生效及随后的适时升级，既需要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我在此倡议：建立 RCEP 区域合作的智库联盟或智库论坛，共同打造开放性、共享性的区域智库合作平台。中改院愿同各方智库一道就 RCEP 区域合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开展联合研究；愿意与各方共建常态化交流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 RCEP 区域合作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交流培训基地。

作者：迟福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 年 6 月 1 日第 007 版

严监管强治理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横空出世，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平台巨头存在不公平竞争、超范围经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如何有效地管控平台经济的负外部性，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以助力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是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主体的当务之急。

1 平台经济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滥用数据和定价权

从国内外平台巨头的运营模式看，滥用数据和滥用定价权两方面容易导致平台经济的负外部性。滥用数据体现在平台巨头利用客户和平台商家的数据资源，为自营产品制造竞争优势。欧盟的调查表明，亚马逊通过利用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数据（如产品价格、销量等）为自营的产品销售获利。通过以比第三方卖家略低的价格销售同类自营产品，亚马逊可以增加自营产品销售，为自身谋取利润的最大化。滥用定价权则表现在平台巨头依托市场垄断优势对平台商家的服务费定价畸高。例如，苹果的应用商店 AppStore 是 iOS 设备分发应用程序的唯一渠道，其不允许在 iOS 移动设备上安装其它竞争对手的应用程序商店。苹果对于应用商店的垄断让其可以对 App 软件开发商收取高达 30% 的服务费（2021 年以前），即软件开发商软件收入的 30% 将以费用形式缴纳给苹果公司。而 30% 的费率水平在充分竞争行业中已高得难以想象。平台巨头滥用垄断权力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负外部性。滥用数据形成竞争优势会助长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损害市场秩序。畸高的定价会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破坏价格体系的稳定性。平台巨头通过滥用平台商家数据挤占平台商家市场份额，会导致平台商家数量大量减少从而带来行业性失业增加。由于选择空间变小，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其权益会受到损害。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平台巨头尤其要注意其负外部性。由于很多投资者是出于对平台的信任才购买其平台销售的理财产品，因此一旦出现违约等风险事件，很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带来阶段性、局部性不稳定。

2 汲取 P2P 平台治理教训

2007 年 P2P 进入我国，2012-2015 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高峰期同时有 5000 多家平台运营，然而短短几年后即走向没落，到 2020 年更被完全清零，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回顾 P2P 的发展历程，不难总结出一些教训。首先，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等属于新生事物，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成果。从顺应国家政策导向、满足社会经济需求和促进行业行稳致远的角度看，有关部门应当对其给予引导，以避免野蛮生长，如从资金或信息撮合平台异化为网贷平台、非法集资平台等。其次，不能低估互联网企业的道德风险。P2P 吸收社会资金的速度很快，动辄几百上千亿，面对短期暴利的诱惑，在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下，人的贪欲很容易冲破道德的围栏，以致走上了自融、欺诈等“邪路”，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广大消费者。再次，金融领域创新所带来的问题根子上都可归结为监管问题。这不单单是指发展初期阶段监管缺位，也包括监管过度或不够精细化等。与 P2P 相比，当前涉足金融业务的平台巨头不但存在类似道德风险问题，甚至还可能利用自身垄断优势进一步放大这种风险。极少数平台巨头私欲膨胀，藐视监管规则，运用平台垄断优势，肆意违规经营，尤其是肆无忌惮地侵犯消费者权益，给市场带来巨大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对平台巨头加强监管，规范持牌经营，推动其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将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

管等，我们认为十分必要且非常及时。从平台发展的角度看，这不但不会抑制创新，反而为其今后在金融领域发挥更大创新价值提供机遇。一是获得金融牌照后，市场竞争将趋于规范，持牌平台机构可集中精力为实体经济和个人客户创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架构后，可以在母子公司之间、各业务单元之间设置“防火墙”，避免风险交叉传染，对自身也是一种保护。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纳入监管后，平台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科技风险、道德风险等都将受到系统性的管控，有利于长期稳健发展。从监管角度看，应汲取 P2P 平台治理的经验教训。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既要落实事后的有效处置，也要将监管措施前置，同时强调过程监管和分类监管；不但要对金融业务风险进行监管，还要对金融背后的科技风险进行监管；不但要对平台巨头进行监管，更要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现象发生。

3 数据违规成本低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无论是平台企业还是监管部门，都应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目前，全球已有 150 个国家和地区对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在征求意见中。2018 年 5 月，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旨在限制互联网及大数据企业对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的滥用。从国际经验来看，良好的数据治理和监管框架至少应具备四个要件。首先是明确“数据主体”的权利，厘清企业的需求边界。GDPR 将“信任”视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资源，将与信任直接相关的个人数据保护作为立法核心。因此，需按照“最小必要”原则，先厘清哪些属于消费者使用产品和服务时必要收集的信息，任何企业都不应超越必要边界，去任意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是做好前置的数据保护设计。GDPR 规定，数据保护防护措施应当在开发早期阶段就内置于产品和服务中，企业在收集、处理用户信息时需事先征得用户同意，并且隐私条款必须以清晰、简洁、直白的语言或其他形式向用户说明。再次是做好过程中的风险监测和快速通报。GDPR 下的数据泄露事件的通报是强制性的，企业应在首次意识到信息泄露后 72 小时内报告数据泄露，不能有不适当的拖延。最后是严格落实事后问责。GDPR 对违规企业的追责处罚非常严厉，最高可达公司全年营收的 4%或 2000 万欧元，以高者为准。2019 年，英国航空就因 50 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被欧盟重罚 1.83 亿英镑。反观违规成本太低，不利于达成制裁的震慑作用。

4 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既要自省自律，又要严格监管

维持平台发展活力和健康，需要企业和监管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既要有行业的自律也要有清晰透明和规范严格的监管规则。首先平台巨头要牢记“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箴言，勇于担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到自省和自律。平台企业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处理好和平台消费者以及和平台商家两方面的关系，担负着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平台企业要维护好客户和商家数据的隐私性，要积极主动地拥抱监管，不能滥用客户和平台商家的隐私数据为自身牟利。平台企业要珍惜平台商家的信任，不要滥用平台定价权。要以和平台商家共同发展的长远眼光来开展业务，适当让利，商家的繁荣才是平台繁荣的基础。金融行业直接连接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更为严格的行业监管。希望深度介入金融业务的平台巨头，应该认识到金融行业和一般商业的不同，要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形成和监管机构之间持续的、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积极主动根据监管要求调整相应业务，合规经营才能行稳致远。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监管机构应以保护平台用户利益为首要监管目标，在新业务发展初期就要有意识地提前筹划业务规范，防止出现行业进入垄断阶段后监管难度加大的状况。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建立和完善多重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提升金融科技的风险防控水平。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息和隐私安全。监管技术必须与时俱进。要夯实数据综合统计和风险监测基础设施，为金融创新和发展提供保障。通过加强国际机构合作，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的监管科技新理念、新技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经验表明，行业自省自律达到较高水平通常是由于长期推行了严格监管，后者为前者创造了良好的治理环境。在平台经济的初期发展阶段，尤其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严格监管上，如打破信息垄断，保障数据产权及个人隐私；规范持牌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范网络金融业务风险潜生滋长；加强对股东资质、股权结构、风险隔离等环节的管理等。通过长期的严格监管，行业规范自然蔚然成风。

作者：连平 刘涛 张秉文（植信投资研究院）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年6月8日第007版

全球经济合作展现强大韧性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展现出新的韧性，维护多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加强烈。”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共振，全球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尽管某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全球经济合作展现强大韧性。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这标志着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启动，成为开放合作的又一生动例证。据国际知名智库测算，到 2025 年，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比基线多增长 10.4%、2.6%、1.8%。RCEP 的启航向世界释放出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强烈信号，为各国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多点、群发性突破态势，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量子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及生物技术蓬勃发展。2020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约为 45.4 亿，普及率达 59%，比 2019 年增长了近 3 亿。全球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以“互联网+”“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合作，也改变着传统行业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改变着资源配置方式和使用效率，为创造新市场新机会新业态提供了机遇，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广阔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面对推动经济复苏的艰巨任务，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必须维护多边体制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已同意于 11 月 29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国际社会对世界贸易组织尽快恢复正常功能给予极大关注。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为抗击疫情、复苏经济采取行动，并发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的声音。这为加强

全球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应对挑战和冲击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和竞争力。中国工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巨大，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有力拉动国际贸易复苏。2020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中国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提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带动世界经济联动发展。2020 年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936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78 亿美元，增长 18.3%。共建“一带一路”为打通地区经济循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搭建了重要平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动能。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身处挑战和希望并存的时代，我们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把握变革机遇，合作应对挑战，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高飞（外交学院副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7 日第 013 版

学科前沿

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十四五”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阶段性特征、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必将在新征程上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围绕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十四五”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阶段性特征、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及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发展拥有诸多新的有利条件，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集中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确立了全面、正确的指导原则，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三者紧密关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既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出发，又极具世界眼光和前瞻性，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

2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在奋斗目标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十四五”时期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在发展主题上，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由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所决定的，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总体上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将优化提质，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同时也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无论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都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在发展主线上，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适应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推动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发展、稳中有进态势，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而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金融结构和技术结构等比例关系趋于合理，适应需求升级变化的需要，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在路径选择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着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改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构建新的供给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

在发展战略上，在重要领域实施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包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要在自主创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农业农村、区域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明确各自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主攻方向、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3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我们要出实招、使实劲、求实效，切实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中去。

更加积极有为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着力点。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加强分类指导，明确分区域推进路径，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以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行动为抓手推动落实“十四五”规划。按照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行动。下一步，要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各自的具体目标、主要任务、实施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及责任主体和推进方

式，健全实施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取得实效。

加强规划衔接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在制定实施国家级专项规划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纲要时要充分体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加强与国家“十四五”规划在发展目标、总体布局、重大工程等方面衔接，推动专项规划从“条”上进行深化、区域规划和地方规划从“块”上予以细化、空间规划从“地”上加以落实。建立分类指导的实施机制、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以及规划实施监督考核机制，及时公布规划实施进展，确保如期完成“十四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

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整体，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发展关系，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突出重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鼓励、保护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举国群策群力、上下联动互动的生动局面。

执笔：王昌林（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6月1日第013版

中国百年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现在，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百年磨砺中的经济建设既有展示成就的主旋律，也有前进中遇到的曲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1 百年经济建设的历史贡献

1.1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和服务革命斗争需要，制定、调整和完善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此乃近代社会中国共产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第一大历史性贡献，而这离不开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以下列举四对关系的处理，足以展现制定、调整和完善经济政策以达到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的贡献。

一是战争与建设。当时，党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对于根据地经济发展实际上列出3个等式：经济无能=无用之人=陷于天亡。

二是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处于根据地时期，保障供给是对武装斗争的直接需求，财政

问题尤为重要，但背后的支撑始终是经济发展。对此，根据地建设突出经济发展成为不动摇的主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财政工作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实的。”

三是土地革命与减租减息。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其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开展土地革命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高度赞誉，“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得解放”成为解放区的象征。然而，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中央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即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土地革命让位于减租减息。

四是公营与私营。公营由于与革命的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受到保护和支持肯定无疑。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在党的发展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私营也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而受到高度关注、重视和扶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地是错误的。”这是根据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一个典范。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由于直接服务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支撑武装斗争，并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应形势和任务需要，动态而科学地选择方针与政策，产生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实效，为共和国建立和党走向执政舞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 建国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途径和方法，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恢复与推进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就公有制而言，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当下，公有制经济依然发挥着主体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对于我国现行经济结构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始终存在一种质疑的观点，这主要源于对公有制资产形态多样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推进以来，我国公有制资产一直处于多形态的探索之中，由此导致的公有经济非但未减弱，而且在增强。目前至少存在五种类型。

资源型资产，土地、矿产、草原、森林、江河、领海无一处属私人所有，即使是农民的宅基地，其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也从未被否定。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型资产，仅以高速公路和高铁为例，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铁路网，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60%以上。基金型资产，这必将成为未来公有资产存在的新型重要形态，如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随着国家投入社保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养老基金为主体、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其权益规模增长显著，已由2000年的200.6亿元增至目前近3万亿元。货币型资产，属于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形态，包括现金以及一年期以内的各类证券。企业型资产，以投资于企业为形态的各类资产，如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国有企业资产等。若按五类型资产计算，确保公有制资产占优势、为主体，经营性资产占比依然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对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

1.3 改革开放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品牌开拓前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里未出现“中国”两字，旨在强调从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体现在三个“发展”上。首先，发展速度。从1978年底到2019年底的40年中，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3%；1992—2019年的27年间，GDP增幅处于6%—14%，既是高速增长，又避免了大起大落。这两个数据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其次，发展规模。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自2009年起，我国制造业总产量处于世界第一，这些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直接推动的成果。最后，发展品牌。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在世界FDI负增长40%的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实现增长4%。

二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历了28年。从理论上讲，实现了纵横的双向突破。纵向突破表明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横向突破意味着打破了单一私有制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限制，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现实。从实践上看，正是实行了这一体制，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我国制造业总量达到世界30%。

三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是相伴而生、相互依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推进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贡献突出体现在质量型目标的选择和有效推进上。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状态和走势及时作出科学判断，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命题，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都是着眼于高质量发展，这恰恰是抓住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抓住了今后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因此，从成效上看，不仅体现在当下（近年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已体现在新发展理念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更是展现于长远。

2 百年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执政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极其丰富，集中体现在四个注重上：注重契合中国国情、注重阶段性发展战略选择、注重融合一切发展要素、注重趋势上的质量型发展。

2.1 注重契合中国国情

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期，着眼于中国国情，体现为依据国情变化调整、完善经济政策。如上述，进入抗日战争阶段，用“减租减息”政策替代“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是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基本民生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没有变；二是面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筑了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举双赢的效应，恰恰是尊重变化中的国情而取得实效的典型案列。

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均植根于发展中的中国国情。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生产力多层次、不平衡的现状，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结构；依据现阶

段我国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经过持续探索和反复试错，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及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依据经济全球化及其新挑战，着眼于我国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的总要求，及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

2.2 注重阶段性发展战略选择

将目标和任务分解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制定方针、政策，这是我国取得发展成就的重要方略。新中国成立后，每 5 年设定一个发展规划，并以年度计划分步落实，同时将之与 10 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相衔接，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划图、线路图和施工图。正是凭借这一周密的发展谋划和实践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 20 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把实现小康目标确定为今后 20 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从 1980 年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2002 年，党的十六大鉴于前 20 年提前完成翻两番目标以及小康社会建设需要全面拓展并提高质量的实际，作出了再用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发起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动员，将“建设”改为“建成”意味着不仅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而且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此后，党的十九大，又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要求，将 2020 年至 2050 年的 30 年分为两个阶段，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 70 年，年度计划、5 年规划、10 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始终伴随分阶段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2.3 注重融合一切发展要素

在资源融合中运行，在优势叠加中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显现奇迹的一大秘诀。

一是所有制结构的融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不同所有制包容并存的一种智慧型选择。让各类所有制优势发挥，并通过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减弱了整体性的负面影响，产生了混合经济效应。如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的公共产品投入以及财政收入增加可作出更大的贡献，而私营经济可在增加就业、丰富民生以及形成创新机制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

二是运行机制的融合。改革开放以后，计划引领与市场调节；政府服务与市场推动相互依存、各得其所，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成效。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始终存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互冲突的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破解过程中，正在赋予有效实践的探索并不断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三是内外开放的融合。在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过程中，我们始终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大会上，明确要求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所谓更高水平的开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国内开放与国际开放贯通和融合。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靠内外开放结合走到了今天，我们必将通过更高水平的内外开放融合走向未来。

2.4 注重趋势上的质量型发展

高质量发展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和要求也不一样。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谋求阶段性发展需要的质量追求并采用相适应的政策举措贯穿于执政时期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的需求急切并布局清晰、发展重点突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即将“快”放在首位的发展

战略。这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快”与质量型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结果带来了“一五”时期的经济繁荣。然而，正常时期持续的“快”并非等于高质量。因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将过去的“又快又好”战略调整为“又好又快”，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样，“又好又快”发展在新时期体现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新追求。自此，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旋律。

作者：王国平（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上海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6月10日第004版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四方面发力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并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四个方面对未来5-15年数字中国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可以预见，未来数字中国建设将会进一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纲要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创新驱动的三个关键指标，并将其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20个主要指标之一，预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7.8%上升到2025年的10%，这是国家规划纲要中首次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纳入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不仅充分表明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更凸显出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前所未有。

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必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难题。未来应重点从四方面发力：

一是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中央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最大隐患。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核心技术难题的重要抓手。重点是建立健全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激励制度、加快数字经济统计与核算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性制度、建立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标准制度体系。

二是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现行基于工业经济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着力破解“个人数据与企业产权”的矛盾，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利用”的冲突。重点要加快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加快制定出台《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与修订向“信息弱者”倾斜，维护其数字消费权益。

三是加大数字风险治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数字风险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加大数字风险治理，关键是探索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数字化监管水平，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着力构建数字安全新生态，完善数据治理规则，推动形成维护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数字经济文化。

四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不同群体、区域、企业之间，在数字素养、数字化应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弥合数字鸿沟，重点应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实施老年人数字能力计划；加快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作者：徐金海（国家开放大学经济管理教学部）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年6月15日第007版

脱碳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助推力量

在未来四十年内实现净零排放对中国而言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碳排放达峰后，政府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加速推进减碳进程。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政府需推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稳步退出，如钢铁和石化产业，同时不断促进经济转向现代服务业和低碳、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还需更多地转向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等低碳发电方式。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除提高森林覆盖率外，中国需增加碳收集和存储（CCS）能力，以便吸收工业生产和运输等减碳“老大难”产业的碳排放量。

1 向低碳经济进行重大转型

中国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将涉及经济结构性转变，对众多产业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电力和供暖、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2018年此类行业在碳排放总量中合计占比接近90%。

长期以来燃煤发电厂一直是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电力行业有效治理需重点推进低碳化结构性调整和提高用电效率。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提高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竞争力，同时发展氢能和生物质能源。

按行业来看，钢铁、化工、水泥建材行业煤炭消耗量大，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此类行业中淘汰原煤的使用要求多项策略共同发力，包括升级设备、生产电气化和转换成低碳燃料（例如换成零排放的氢能和现代生物质能）等。我们认为政府或将强化产业强制性能

效目标，鼓励发展低碳制造业。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到 2022 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重提高至 70%。为控制生活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有必要推动广大农村和城镇地区用清洁能源和低碳燃料替代散煤的使用，如利用输电网络、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和新型生物质能源等。同时，为新建建筑制定热效能执行标准，并改造现存建筑以提高能效。

随着近几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交通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转换成低碳燃料或转变供能模式）是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我们建议，考虑制定 2050 年前全国范围内机动车零排放的长效方案，包括提供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和提高燃油标准等。

与此同时，我们预计政府或将出台全面改革方案，推动商业向低碳增长模式转变，提高国内消费占 GDP 的比重，扩大服务业比重。此外，政府提出将推广低碳、高附加值模式，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

能源消费体系方面，中国提出到 2030 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 2019 年底的 15.3% 提高到 25% 左右。为实现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研究估算到 2060 年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降至约 15%，基本可被碳收集和存储所吸收，75% 的能源消费为可再生能源，余下 10% 为氢能。绿色的氢能和生物燃料可用于长途运输、航空运输、化工领域和高温加热工艺等无法使用电力的场景。中国在上述领域已经开展了众多研究项目和试点项目。接下来，政府应进一步提供政策激励，以推广上述技术的使用并实现规模经济，使其具备较强商业竞争力。

2 抓住机遇，降低转型成本

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利用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太阳能面板从成本高昂的能源选项，变成了成本最低的清洁能源生产设备。中国有能力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工业生产领域取得类似成果。

巴黎协定签署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承诺将共同遵守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多数产油国或将承受巨大的转型成本。与此同时，中国有大量投资清洁能源的内在需求，因而有望从这一转型中获益；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效应有利于降低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我们认为一旦全球大部分能源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通过太阳能面板和风力电机发电）而不是从地下开采（例如化石能源），中国将有望成为清洁能源及其制造设备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转向“绿色经济”将提供巨大的基建投资机遇，包括特高压输电网、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等。目前中国电网灵活性仍然较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削减率较高。高度灵活性的电网，包括广泛利用需求回馈、电力存储和电动车充电站，将带来经济效益；运营成本下降和避免用电峰值的高额支出，则有望降低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将会增加并进行数字化整合，从而接入智能配电网络。一旦电动车大范围普及，对充电站的需求将显著上升，充电站投资更加有利可图。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长期来看脱碳会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避免经济损失而提高国民收入，但其要求的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和较为依赖高碳能源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初期可能出现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等现象，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关键角色，

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其他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等投资的增加将提高产出，继而推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需寻求途径减小碳关税带来的影响，并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推动碳减排。如果对出口商品碳排放征收碳关税，将可能抬高中国出口的成本，影响部分生产商的利润和出口商品竞争力。为应对国际贸易中的上述挑战，政府或需推进国内碳排放市场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整合，降低碳关税支付或取得豁免，同时在国际多边气候治理框架内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推动与发达经济体进行联合气候行动。中国企业需加强对自身产品在供应链中碳足迹的监管，尽早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减轻影响。政府也可考虑鼓励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利用绿色融资投资绿色基建、绿色制造业和绿色科技，更好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3 金融业将起重要作用

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我们估算 2060 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进行高达 127 万亿-192 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 3.2 万亿-4.8 万亿元。我们认为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绿色融资渠道在为清洁能源融资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预计人民银行将通过再贷款工具、降低对银行绿色资产的资本金要求和推动绿色债券作为央行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等方式，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推动绿色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营造有利环境和制定政策框架，具体或包括：一是增强市场透明度，完善数据流，向民营投资者提供精确的投资风险和机会的相关信息；二是统一地方绿色金融标准，提高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三是提供与减少碳足迹有关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四是引导长期资金参与绿色融资（如养老基金、保险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和共同基金）。

中国的金融机构或将在管理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相关风险方面起重要作用，包括评估涉及此类风险的现有投资组合敞口，以及寻求减小和分散此类风险的金融操作。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相关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计划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

针对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对其进行合理定价，将会提高化石能源消费的成本并推动低碳替代能源的使用。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要求企业购买排放许可证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中国将在今年年内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需明确排放目标，提高交易规模和市场参与度，增强价格发现能力。

当前国内碳排放市场还需增强流动性，扩大机构投资者和拍卖许可规模。目前来看，跨地区交易较为少见，交易多集中在每年特定时期。市场参与者均为背负不同减排成本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时仍面临一些挑战。碳排放权交易新规显示，多数许可证为免费发放许可，且将在合适时机引入拍卖机制。目前，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价格较为波动且价格仍较低，约每吨 20-40 元人民币，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需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国内碳排放价格接近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约每吨 75 美元），以便降低碳排放强度。

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针对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征收碳税。碳税旨在增加化石燃料、电力和一般消费品的价格，推动向低碳燃料发电转型，节约能源使用和转向更清洁的

新能源汽车等方向。鉴于碳税可以直接对碳排放权定价，且碳税收入可用于为清洁能源和相关基建项目、绿色科技和新技术融资，或可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内受到负面影响的低收入群体提供财政补贴。

作者：申岚（渣打中国经济学家）丁爽（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 年 6 月 10 日第 004 版

经管资讯

美欧暂停贸易战火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 6 月 2 日宣布，将暂停对英国、印度、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六个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为期 6 个月，同时致力于解决数字服务税的争议。

美国暂停对六个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对于 6 月 1 日欧洲宣布正式暂停对美国征收 50% 威士忌关税的积极反馈。美欧在这礼尚往来中，希望走出上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边挑起的四年来的美欧贸易战，恢复以往传统盟友的合作局面，以期联合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贸局势。不过，美国还是留了一手，此次惩罚性关税的征收只是暂停，宽限六个月予以解决争议。戴琦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就包括电子服务税在内的国际税收问题找到多边的解决方案。”但她同时表示，对于对数字服务产品征税的国家，美国仍然保留对他们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的选项。

美欧从四年来的贸易战转向平心静气，5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联合声明起到重要作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举行谈判，以避免欧盟继续提高对美报复性关税，不让双方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争端升级，并希望有关争端能在今年年底解决。在讨论期间，双方不会进一步提高现有关税。另外，7 月起欧盟将不再对美国波旁威士忌等标志性产品征收双倍关税，同时双方将就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开展对话。欧委会发言人还表示，钢铝关税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欧美关系，而在于全球钢铝产能出现过剩，并期待与美合作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这份联合声明意味着欧美关系从争端走向休战，并开始积极修复之前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中伤的传统友谊。

自拜登上台以来，美欧贸易争端有所缓解。3 月，欧美同意把因飞机补贴争端而施加的进口关税暂停 4 个月，美国取消 75 亿美元欧盟输美商品关税，欧盟取消近 40 亿美元美国输欧商品关税，双方从剑拔弩张的贸易战中各让一步。

而且，美国面对欧洲急需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能源也有手下留情的意思。6 月 1 日，德国与美国官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北溪-2”项目举行会谈。此前有消息透露，美国政府打算放弃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方及企业负责人实施制裁。“北溪-2”是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达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绕开乌克兰和波兰等国，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继而送往其他欧洲国家。这一项目将使俄罗斯向德国天然气出口量翻倍，如今已完成 95% 的建设。美国如果放弃制裁“北溪-2”项目，对欧洲尤其是德国利用清洁能源达到

碳中和目标有着积极作用。

另外，美国呼吁就全球最低关税希望欧洲与其站在一条线上。拜登一直着力推动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意图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统一为 21%，以阻止美国企业将总部迁往税率较低的国家。对此欧盟表态支持，但交换条件是需让欧洲开征数字税。目前，七国集团（G7）已接近就跨国公司的纳税规则达成协议。

而且随着马上举行的七国峰会和美欧峰会，美欧意在更多领域进行沟通，消除分歧。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 6 月 11 日至 13 日访问英国，出席在英国举行的 G7 领袖会谈。随后将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领袖会议与美欧峰会，并与欧方就贸易合作问题展开讨论。这是拜登上任后首度出国访问。

从近期双方释放的积极信号来看，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峰会召开前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亮明“善意”，以便为峰会铺垫更大的公约数，扩大协商的基本面，寻求恢复被特朗普执政期间搞僵而趋冷的跨大西洋关系。

作者：路虹

来源：《国际商报》2021 年 6 月 4 日第 004 版

外资为何青睐人民币债券

人民币债券对境外机构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 900 家境外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持债规模达 3.3 万亿元。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较 4 月增加 413.17 亿元。

从 2016 年中国债券市场加快对外开放以来，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相关投资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人民币债券吸引力何来？

首先，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为吸引外资持续流入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 年以来，外资增持人民币债券的长期性、稳定性特征凸显，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持续呈现积极变化。尤其是 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8.5%。这是中国债市能够持续引流的重要原因。

其次，利差是境外机构连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的另一主要因素。中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中美利差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虽然今年以来中美利差有所收窄，但并未对境外机构增持行为产生明显影响。这是因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较强的避险资产属性。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基调下，利率预计将保持基本稳定，中美利差可能继续维持在高位，这给了境外机构继续增持的动力。

再次，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入快车道，为“打开门迎客”创造了良好环境。中国债券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品种丰富，交易工具齐全，基础设施安全高效，具

备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向 17 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了 103 亿美元额度，成为自 QDII 制度实施以来单次批准额度最多的一次。去年 9 月以来，外汇局已累计发放 7 轮 QDII 额度，呈现常态化特点。

中国债券市场还需要继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占比还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到去年年底，外资持有债券占中国整个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 3%，低于美国（28%）、日本（14%），也低于巴西（9%）等新兴市场国家。

近年来，央行已统一了债券市场准入和资金管理等制度安排，提高了境外机构入市便利度，进一步优化和便利投资资金汇出汇入。接下来，仍需要积极完善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持续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随着债券市场的持续开放，债券或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吸引外资的重要阵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国内需求加快恢复，投资动能较强，消费明显好转；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储备充裕，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这均将支撑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信心。通过投资中国债券等人民币资产，国际投资者也将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作者：金观平

来源：《经济日报》2021 年 6 月 13 日第 001 版

电商消费狂潮背后的新模式探索

透过京东“618”引爆的年中消费狂潮，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电商正在激发产业创新能力和活力，带动产业转型和商业模式转型。而在第四次浪潮到来、新技术集中爆发的大背景下，电商无疑在中国新商业模式探索中起到了大的引领作用，引发了一代代新的商业架构的出现，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全球更具竞争力。今年“618”期间，京东物流服务范围覆盖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城镇和人口，92%区县和 84%的乡镇实现当日和次日达。如此高效的物流网络及其背后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建立在一个地貌最为复杂、人口世界第一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有观点认为，在这个速度时代，全球的国别经济不是被摆到一个技术、质量、成本等诸多工业因素的竞争赛道上，而是被摆在速度统辖一切的道路。一直被排除在生产数据之外且被赋予更高速度的时间，正在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因此，作为生产要素，时间的价值衡量方式是这样的：数据通信速度减物理实体运动速度的差越小，这种经济体的经济竞争力就会越强。也就是说，当 5G 时代数据通信速度保持基本稳定之时，物流速度越快则竞争力越强。中国经济领先全球的增长速度，已不能从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其深层次的因素是，我们创造出了比别的经济体更多的时间。可以说，中国的高效物流网络和强大供应链体系也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压缩了实际的社会物理空间，也在不停地重组经济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高效物流网络和强大供应链体系是科技能力打造的成果。中国互联网技术的积淀已然让各种新技术的探索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而这将引领产业开创一个要素核聚变反应时代。

以京东提出的一体化供应链概念为例，所谓一体化供应链早已颠覆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物流概念，一言以蔽之，京东物流可以参与到客户的整个决策，用供应链的视角对各个环节进行审视，帮助客户实现全局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今年“618”期间，京东智能供应链每天给出超 40 万条供应链智能决策，京东与 64.3% 的自营供应商实现了智能供应链协同。而基于智能决策的预售前置，也使今年京东“618”实现了 200 个城市的分钟级送达。正如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所言，现在的京东“618”已不是单纯的消费属性，而演变成了消费生产双重属性，成为一个链接消费端和产业端，推动数字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舞台。“一张网，盘天下货。”这张网实质是一种数字形态与物理形态融合的、崭新的中国经济拓扑结构，这种结构所能释放的经济当量还没有被我们认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全球最大的数字商业平台的建立、覆盖全国的物流基础设施的重组等波澜壮阔的产业重置，仅仅是认识中国经济新拓扑结构一些显而易见的线索而已，最为重要的结构变化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工业的互联网化革命。

正如业界资深专家罗清启所描述的那样，率先大规模的综合脱域运动已经把中国工业送入到一个完全有别于现代工业的工业频段之中，支撑全球最大规模工业体系所需要的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的成本中心和最强的科技创新中心三大中心的作用，在大规模社会创新方式的冲击之下已经难以维系。原来的这三大中心是在工业的大规模制造体系的支撑之下而存在的，现在“千人一面”的工业大规模制造体系正在被“一人一面”或者是“一人千面”的定制体系所取代，大规模制造体系下的需求、成本、科技创新三大中心都必须锚在大规模的社会创新上，这是发达国家工业体系单纯依靠工业装备革命所解决不了的。这种新模式的探索已经在电商平台显露雏形。京东早在 2019 年就建立的 C2M 平台正是这样一个定制体系。今年“618”期间，C2M 平台联手品牌方反向定制了多款符合用户需求的新品，如“轻食电饭煲”“不用手洗破壁机”等，不少“出道即爆品”。可以看到，当每个人包括消费者都成为创新的主体，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方式将几乎不再受到限制，全社会都将被推入到一个大规模的创新时代。

面向未来十年，刘强东提出，京东将潜心打造新一代基础设施——京东数智化社会供应链，这是基于其对未来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的认知。如同罗清启所言，在未来的工业形态下，需求、成本、科技创新都分别是大规模创新的一个向度而已，这是中国工业革命向世界贡献的新的工业意义，工业将成为大规模创新的隐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当然也不缺乏能力去最大规模地拥抱全球任何时点和任何地点的科技革命。

作者：吴蔚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 年 6 月 24 日第 005 版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从大数据中心建设到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是实现产业聚集、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为抓手，通过数据流引领带动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等，有助于打通我国东西部数字经济的大动脉。

近年来，大数据中心成了“香饽饽”，不少地方竞相投资建设，各种大数据中心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规模约 500 万架，近 5 年年均增速逾 30%，是全球平均增速的 2.3 倍。大数据中心受追捧，并非没有道理。在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大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不仅为各行业“上云用数赋智”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也为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可能。但也要看到，大数据中心“一哄而上”，可能带来产能过剩风险，而数据中心之间若不联通，还会造成有效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不仅如此，大数据中心自身绿色发展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据统计，当前我国各类数据中心年用电量已占全社会用电的 2%左右，耗电量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 10%以上，以至于东部一些地区明确将数据中心定位为高耗能产业加以限制发展，而西部地区虽可再生资源丰富、气候适宜，但受限于网络带宽小、跨省传输成本高等瓶颈，难以有效承接东部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的失衡。

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对全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进行了整体布局，同时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可谓既必要又及时。事实上，在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市场各方对一体化推动大数据中心协调发展的呼声渐高。一方面，亟需改进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布局、发展模式，推动大数据中心向绿色高效、集约化发展转型；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数据中心、云、网络之间的协同联动，避免形成数据中心“孤岛”效应，提高资源的整体利用率。上述实施方案的出台，可谓从国家层面为我国算力网络体系建设提供了“施工图”。

有市场观点认为，大数据中心兼具地产属性和 IT 属性，是“IT 中最像地产的，地产中最像 IT 的”。确实，一些地方存在借大数据中心之名圈地发展房地产的现象，但以此给大数据中心进行“画像”，显然是对大数据产业的一种误读。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中心不应简单地被定义为数据的仓储空间，它还应具备数据加工和智能化分析的功能。换言之，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据的存储能力，还要强化在算法、算力上的能力，推动大数据中心从“瓦特”向“比特”的转化。这恰恰正是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的目的所在。按照实施方案，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以及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全国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统筹规划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布局，引导大数据中心适度集聚并形成数据中心集群，且在集群之间建立高速数据中心直联网络，最终形成以数据流为导向的新型算力网络格局。

从经济角度看，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技术经济最优化的必然选择。打个比方，就如同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水、西电东输工程中的电，“东数西算”工程中的数据同样至关重要。当然，从大数据中心建设到数据要素跨域流通，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实现产业聚集、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为抓手，通过数据流引领带动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等，不仅有助于打通我国东西部数字经济的大动脉，也将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新动能。

作者：顾阳

来源：《经济日报》2021 年 6 月 4 日第 005 版